

志業與傳承：回憶張朋園先生

● 黃克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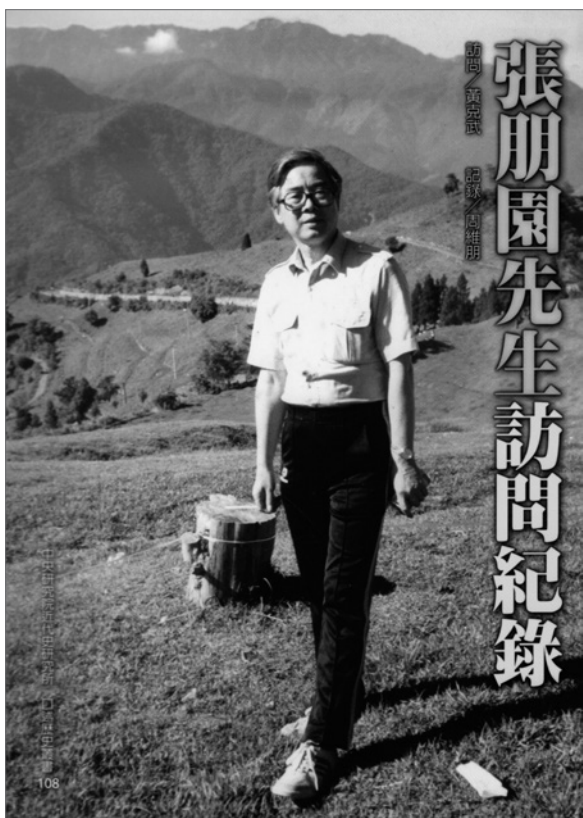
張朋園先生於2022年11月25日過世，享年九十七歲。一周之後，《張朋園先生訪問紀錄》（黃克武訪問，周維朋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2。以下引用只註頁碼）出版，此書未能在張先生生前問世，讓我深以為憾。這一本書記錄了一個出生於1926年的貴州省普通人家的孩子如何經歷抗日戰爭，投身軍旅，再隻身來到台灣，努力求學、成家立業，進而成為一位傑出的歷史學者。他的一生不但顯示個人的奮鬥，也反映了時代的變遷。

張先生一生的經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早年成長與求學的階段；第二是1961年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服務至退休的時期。張先生出生於貴陽近郊花溪區石板鎮的合朋村、後寨園，因此以「朋園」為名。他的父親早逝，母親以開客棧、種鴉片、幫傭等工作撫養兒女成人。張先生在貴陽就讀小學與中學，中學肄業後就因家境因素到石印廠當工人、到國貨公司擔任售貨員。1937年抗戰爆發，張先生於1943年投考軍政部戰時軍用衛生人員訓練所學習護理。後該校改制為國防醫學院，由林可勝將軍擔任院長。張先生在高級護理職業班畢業，留校擔任助教。張先生說報考軍校、從軍救國是他人生第一個轉捩點，也是那一個時代青年人毫不猶豫的選擇。1949年2月因國共內戰，他隨着學校來到台灣，官階為少尉，後通過高等考試升等為中尉。1952年，張先生考上省立師範學院（今日的台灣師範大學）就讀史地系，而選課以歷史為主，此後才脫離了軍隊。在求學過程之中，他曾修過郭廷以先生所開的「中國近代史」，種下與郭先生一生的師生因緣，他與李國祁先生成為郭先生最欣賞的兩個弟子。大學畢業之後，他又就讀師大國文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在台灣歷史博物館服務了五年。1961年夏天，因為徐乃力、李國祁兩位先生的推介，在與郭先生面談之後，9月16日到中研院近史所服務。進所之後，因獲得美國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的資助，赴哥倫比亞大學升學，由韋慕庭（C. Martin Wilbur）先生指導，取得碩士學位。他又趁此機會去哈佛大學訪問，結識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先生。韋、費兩位先生不但帶領他進入西方的中國研究，也提醒他注意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重要性。

張先生說進入近史所之後開始「小學徒」的生活，一方面從事口述歷史的工作，先後參與了十三種口述歷史訪問計劃，另一方面開始做專題研究。當時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世界書局，1958）剛出版，郭先生建議他以此為題。他回去之後反覆看了兩三遍，感到這一部書的史料價值非常高。他以此為基礎先後寫成了《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出版社，197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等書，這三本書顛覆了台灣學界以國民黨為中心的「革命史觀」，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地位。張先生以英文發表的〈立憲派〉（“The Constitutionalists”）是哥大的碩士論文，由韋慕庭先生指導，後來他參加1965年由芮瑪麗（Mary C. Wright）召開的學術討論會，該文後收入《中國國民革命：第一階段，1900-1913》（*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這是第一篇有關立憲派的英文論文。

在撰寫這些作品的過程中，張先生深深地受到兩位學者的影響。第一位是郭廷以先生，郭先生不但指點他研究梁啟超，幫他商榷書名、架構，還一字一句地為他改文章。因為郭先生的修改，他把文章中的贅句，如「因為」、「所以」、「而且」等連接詞去掉，因而更為通順。張先生說：「郭先生改的稿子真是一字千金，令我受用不盡……這真是對我的大恩大德。」（頁57）郭先生還勸他「勤於動筆」（頁112），努力磨練自己對文字的掌握。張先生說他寫梁啟

超一書時，朝思暮想的都是梁啟超，而一有所得立刻記下來，再整理成文。這就是郭先生教他的治學秘訣。另一位十分鼓勵他的是蕭公權先生。蕭先生看了他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之後非常欣賞，為他寫了一篇序文，還鼓勵他繼續研究「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後來蕭先生也為《梁啟超與民國政治》撰寫了一篇序言。汪榮祖先生說，蕭先生從來不為他人做序，這兩篇序言是蕭先生「唯二」之作。在序言之中，他稱讚此二書為「精心結構的著作」，還說：「作者於述論梁氏言論時不但詳細地舉其內容，並且說明其發生之根源以及轉變之背景，於是其歷史上的意義，豁然呈露，這可以說是治思想史的『上乘法』。」（〈蕭公權先生序〉，載《梁啟超與民國政治》〔2006〕，頁1）此外，蕭先生又指出梁啟超與革命黨有不同的西學淵源，梁任公的思想較接近「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受到洛克（John Locke）與穆勒（John S. Mill）影響。革命黨也講民權，然而他們的思想淵源無寧說是「法國革命先覺的盧梭」（〈蕭公權先生序〉，載



《張明園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2）。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頁2-3)。這一句話對我個人有很大的啟示，我寫的梁啟超、嚴復等書(《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主旨就是發揮此一對照。至於當時美國學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梁啟超與現代中國的心靈》(*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一書，蕭先生說：「雖然旁徵博引，大放厥詞，卻不免有捕風捉影、弄巧成拙之感。」(〈蕭公權先生序〉，載《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頁1)兩相對照之下，功力高下立判。

張先生自1970年代開始又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這一個計劃受到1960年代以來美國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理論影響。計劃分為兩個階段，共有來自近史所與師大的十多人參加，第一期(1973-1977)研究沿海沿江的十個省份，第二期(1985-1989)則研究內陸省份。後來這兩個計劃共出版了七本專書。張先生說：「第一階段做得有聲有色，第二個階段氣勢相差甚多。」(頁87)這兩個階段的成敗涉及第二階段研究開始之後，由於中國大陸資料的開放，史料數量大幅增加，較難掌握，許多計劃因而受挫。這一個計劃受到學界的不同評價。在大陸學界，如研究現代化的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就十分讚許。然而美國學界對之則褒貶不一。1970年代末張先生曾前往史丹福大學訪問，當時在該校攻讀博士的陳永發全程陪伴。張先生在該校做了一次演講，介紹現代化研究計劃。他的演講並未受到聽眾肯定，因為當時美國已開始轉向「後現代」(post-modern)探討，對於張先生所倡導的從現代化的角度觀察中國近代史採批評的眼光。張先生演講時有人問他是否贊成「工業化」，張先生表示支持，「這話一出口，立刻引來眾人嘲笑，認為我完全沒有環保意識。確實，我當時並未具備環保觀念，只重視工業化使經濟成長的想法，……我完全沒有注意到工業化帶來的負面影響」(頁87)。此一問答可以反映「現代化」與「後現代」的對話。對尚未完全現代化的大陸學者來說，此一研究計劃頗具新意，然而對於開始思考後現代議題的美國聽眾來說，此一計劃似已過時。

張先生所採取的現代化視角與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傳承有關。他毫不諱言自己是五四運動的支持者。他對宗教不感興趣，一生的學術研究主要關懷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民主、科學與經濟發展等問題，並思考在此過程中傳統有何改變的契機，究竟是阻力還是助力？他也思考近代中國「革命」與「現代化」的兩難——革命雖打破傳統，帶來改變的契機，卻也造成社會動亂，推遲了現代化。他最欣賞的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溫和、穩健的現代化模式。他在2007年所寫的《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0-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2015年出版的《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任黨人繼志述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都是從歷史角度思索威權轉型與民主政治的建立在中國所遭遇的困難，以及其可能的出路。

張先生所做的歷史研究都針對歷史上的核心議題、一流人物，因而有其重要的貢獻。他曾告訴我的同事黃自進先生，歷史研究的選題十分重要，研究二流人物多半只能寫出二流的歷史作品，研究一流人物才能寫出一流的著作。此一論斷受到「英雄史觀」影響，雖然不能說是歷史研究的鐵律，卻對我甚有啟發。

張先生曾說：到近史所服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前顛沛流離，在此之後人生進入平穩的發展，此後一帆風順。他在近史所工作到1996年底七十歲屆齡退休。退休後，他繼續筆耕不輟，幾乎每天還到研究室工作，將近九十歲時出版有關孫中山思想的專書。這一種對學術「志業」的堅持，令人敬佩。

這一本《張朋園先生訪問紀錄》斷斷續續做了十多年。大約在2003年，張先生退休不久，我就想幫他完成一部回憶錄。剛開始他也很感興趣，我們見了三次面，談到他的家世與青少年時代。後來他謙虛地覺得自己是一個不重要的小人物（他說自己是nobody〔無名小卒〕），不值得記錄，訪問工作就中斷了。2004年近史所出版了一本《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紀念近史所成立五十周年，我趁着這一個機會做了一次張先生的口述歷史，主要集中在他與郭先生的關係。2015年是近史所成立六十周年，我當時擔任所長，組織了一個近史所同仁的口述訪談，書名為《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張先生也是其中一位受訪者，訪問工作由陳儀深先生負責，談張先生在近史所的工作經歷。不過，這二篇訪問記錄都不夠完整。

2020年，張先生已九十多歲，他幾乎每天還來辦公室，下午6點左右準時下班。這時他比較不忙。我又提議繼續做口述歷史。他勉強答應，只是此時記憶力已大不如前，耳朵也變得不好。我大約每天4點到他的辦公室，聊一個多小時。我們又連續做了六七次訪談。《張朋園先生訪問紀錄》就是以上述訪問內容整理而成。為了更深入了解張先生，我也訪問了師母汪雁秋女士。再加上幾篇張先生自己寫的師友雜憶與張先生的編年著作目錄，希望可以忠實地呈現他的一生。

2020到2022年是張先生一生的最後階段。這一階段也因為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關係，社交活動受到限制。張先生與張師母因為年紀大，都沒有打疫苗，為了避免讓他們染疫，除非必要，我較少與張先生接觸。不過在2021年之前，張先生的身體仍十分健康。我最後幾次與張先生見面時，他的情況仍然很好。2020年10月8日中午，張先生請我去他最喜歡的一家湘菜館1010湘吃飯。當天他胃口甚好，點了剁椒魚頭、蒜香孜然排骨等他喜歡吃的菜，飯後還去隔壁的咖啡廳喝咖啡、吃甜點。我的日記記載：12月1日，「下午四點去看朋公，聊了一個小時左右。他身體尚可。說自己是nobody，不寫回憶錄」。2021年3月11日，「下午二點半在檔案館訪問張師母，老師也來了。他的氣色不好，沒刮鬍鬚，頭髮亂糟糟」，後來聽說，他的腳已水腫。20日，為了慶祝口述歷史完工，我們又去1010湘吃飯。張先生還是爽朗、健談，胃口也很好。



2018年8月30日攝於野柳海邊。(圖片由黃克武提供)

到了2021年的下半年，張先生身體開始衰弱。8月11日，我寫到：「下午去看張朋公。他頭腦仍清楚。只是腰彎了，瘦了許多，體重只有43公斤。他說他從二十歲到四十歲抽煙，對身體有負面影響。他又說郭廷以先生75歲死、費正清先生82歲死、韋慕庭先生89歲過世。他們都不算長壽，我活得比他們都久。走時，他一直送我到檔案館門口。」那一次之後我們就很少見面。

2022年張先生身體較差，腳慢慢變得沒力氣。6月6日，我送口述歷史的稿子過去，老師在沙發上睡覺，我叫了他一聲，他沒有回應，這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面。7月26日開始他臥病在牀，隨後的幾個月他的身體一直出狀況，先是送三軍總醫院，後來轉到忠孝醫院，最後在三總病房睡夢中辭世。

張先生不但是以學術研究為畢生使命的優秀史學家，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師。我很幸運地有大約四十年的時間與張先生相處。張先生是我在台灣師範大學的老師。1983至84年，我在師大研究所讀碩士班的時候上他的「中國現代化專題討論」的課程。他當時正與李國祁先生負責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集體計劃，這個課程帶着我們讀了許多現代化理論以及西方漢學著作，開啟了我對學術研究的興趣與新的視野。他對我直接的幫助是介紹我認識西方學者，如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先生當時還是以哈佛的一位研究生身份來台訪問。張先生介紹我認識方先生與他的夫人，要我們兩人彼此幫助。1984年孔飛力(Philip Kuhn)教授到近史所開會，張先生請他與其他幾位學者到家裏吃飯，我也應邀作陪。當時我只是碩士班的一個學生。他告訴孔教授，我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學生。

碩士畢業之後，呂實強先生要我申請來近史所工作，1985年10月我順利進所，與張先生成為同事。後來我有機會去英國、美國讀書，此時我們也常常通信。他對我開始研究梁啟超的思想感到十分高興。他說「你的大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我拜讀了一遍。……我非常細心地讀你的大著，告訴老兄，

我完全被你說服了，我同意你的看法。」(張朋園致黃克武函，1993年3月3日；此即後來出版的《一個被放棄的選擇》)他又告訴我：「你談近年來對梁啟超的研究，我讀了有進一步的體會，我很高興你也對梁有興趣……我們對梁啟超的了解尚不夠全面性，他寫的東西太多了……要是大量的投入研究，他的地位必定可以提升起來。」(張朋園致黃克武函，1993年4月4日)。後來梁啟超成為我研究的一個焦點。總之，張先生是我在近史所工作時影響我最深的一位老前輩。他的治學精神、為人風範都是我最景仰的。其中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我曾多次陪他出國開會，從1993年開始，我陪張先生去大陸開會，跑遍了大江南北，讓我與大陸學界深入交往，並認識各地的風土民情。

2008年10月底，我和張先生應章開沅、田子渝教授之邀，去參加武漢抗戰七十周年研討會，又去江西婺源、景德鎮、廬山，返回武漢之後飛去成都四川大學訪問。我在旅途中曾問過張先生幾個問題：

第一，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情是甚麼？他說：他最高興的是能進入近史所，追隨郭廷以先生。而他最好的著作是兩本梁啟超的書、一本立憲派的書，奠定了學術研究的基礎。第二，他一生中最遺憾的事是甚麼？他說年輕時沒有好的家庭環境，又親歷戰爭，沒有機會好好讀書。他又說中學與西學有如人的兩手，缺一不可。他的中國學問受郭先生影響；而他的西方學問受到費正清、韋慕庭兩位先生的影響，開始接觸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科際整合，後來又自學政治學。他的研究能有所貢獻的話主要來自中西學的結合。第三，他送給學生的話是甚麼？首先，他說郭先生曾給他四個字：「勤於動筆」，這句話對他有很大的幫助，他轉贈給學生。其次，他年輕時脾氣不好，因而造成一些糾紛，他勸戒學生「不發脾氣」，平和從容地應對生活，追求理想。第四，健康長壽的養生秘訣為何？他說人活着就要「動」，腳要能走路。他堅持早上起牀之後在附近走走。這個習慣他一直維持到九十多歲。此外，他說不要有太多的欲望，如果能夠把名與利都看輕一些，會活得更愉快。另外我發現，張先生因為有衛生的專業訓練，他的生活起居十分規律，而且隨身都帶有必備的藥物，能應付突發狀況。這應該也是他能長壽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這些點點滴滴對我都深有啟發，並銘記於心，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對於張先生的辭世，我深感悲痛。我想起他在《張朋園先生訪問紀錄》的一段話：「中外都有報恩的觀念，有一次我感謝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先生在我訪問美國時，給予許多幫助，費先生簡單地回應“pass on”(傳承)。」(頁57)我想對於張先生，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精神傳遞下去，出版這一本口述歷史的用意在此。這或許是紀念張先生最好的一個方式。